

“三三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特质及其当代启示

何鲁婷, 李向勇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三三制”民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种政权体制模式,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步探索,这一模式不仅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三制”民主;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4)02-0001-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4.02.00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Three Thirds System”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HE Luting, LI Xiangyo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Three Thirds System” democracy was a political system cre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Yan'an period, which creatively combined the Marxist democratic principles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China. A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is model not onl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counter-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but also holds signific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ree Thirds System” democrac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454}。2021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

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454}这一阐释将人民民主完善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对后者进行了明确定义,这为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基本遵循。2021年11月,全过程人民民主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

作者简介:何鲁婷(1996—),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李向勇(1979—),男,河南洛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不断发展完善的历程也是对中国特色人民民主鲜明特质的科学总结,对于更好发挥中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和治理效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延安时期,面对新阶段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全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积极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三三制”政权模式。在政权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的左派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以此形成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体制。从历史维度看,“三三制”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已经呈现较为明显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特质。目前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颇多,大部分学者主要集中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体性研究上,如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进路、特征优势以及时代价值^①的分析与阐释,而对其实践发展和探索历程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具体到关于延安时期人民民主建设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三三制”民主来阐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步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推行“三三制”民主的历史原因

坚持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既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根本途径,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内生动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复杂严峻的现实,坚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政权建设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和推行了“三三制”民主模式,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推行“三三制”民主的主要原因。

(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政权建设理论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立足于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政权建设理论,内在形塑了中国民主实践的独特意蕴。延安时期,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推行“三三制”民主的过程中,开启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步探索。

首先,“全过程”指的是民主的具体形态。此处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过程的集合体”这一思想来研究民主发挥作用时的具体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思想,以事物运动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特征为依据,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过程”,是处于联系之中并一直发展的过程。其一,每一个事物发展的前后过程、前后阶段之间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事物内部的每个过程也在相互联系之中共同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其二,过程是事物发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延伸,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都是在过程中完成的,而每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附属于一个更大的发展过程。“三三制”民主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思想而具有“全过程”的特征,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一模式通过完善协商民主运作体系来扩大基层民主覆盖面,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汇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力量,从而区别于西方的民主,以一系列完整的制度安排来保障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

其次,“人民”指的是民主的适用范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和使命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

^①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曹世红、韩柱著《理论·内涵·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维度》,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肖立辉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体系框架》,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1期;张明军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载《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9期。

政党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有两层含义。其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精神的人”和“抽象的人”时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4]。马克思主义认为,处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其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通过在实践中创造和生产社会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变革并进而推动历史发展。其二,人民是创造和评判价值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也是根据其自身需要而被创造的。“把人和人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5]人民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创造价值,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也为社会发展创造价值。而由人民创造出来的价值,理应由人民共享、受人民评判。因此,马克思所倡导的民主观是以人民为中心,他认为“争取实现一种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的崭新的国家形式”^[6]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民主应以“人民性”为核心理念。同时,追求民主的过程应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真正实现的过程。“三三制”民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人民立场的基础上,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目的,在制度程序层面与实践参与层面真正做到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最后,“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争取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表面上的民主”,仅仅取消了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资格限制条件,而对于最具根基性和决定性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却坚决维护。因此,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以及真正的民主制度。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8]。

无产阶级只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治阶级,才能争取到最全面最真实的民主。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9]的著名论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推行了“三三制”民主政权体制模式,这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雏形。

(二)新的革命任务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政权建设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并推行人民民主是践行初心使命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初步探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原则和实践模式可以效仿,而是面对新阶段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任务,从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局着眼,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保证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所进行的实践创新。

首先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1935年8月,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初步形成。“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党外民主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同年9月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面对民族危机,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由相互对立到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革命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民主的设想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巩固发展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需要。“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十数个抗日根据地,不仅稳定了战争形势、凝聚了抗日力量,而且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根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一边消极抗日,一边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

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并制造了一系列冲突和摩擦，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此，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10]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不仅为巩固发展陕甘宁抗日革命根据地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推行“三三制”民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最后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最大限度领导全国各阶级、阶层共克时艰的需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打击目标重点放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对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毛泽东曾经如此描述当时的困境：“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1]1939年1月，为摆脱困境，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发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同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生产委员会，广泛调动边区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由此，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揭开序幕，随后逐步推广到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的粮食逐渐实现了自给有余，极大地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群众共克时艰的信心，从而使其更加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为顺利推行“三三制”民主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三三制”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步实践

1940年3月，毛泽东针对政权分配问题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2]而后，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进一步阐明了“三三制”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共产党员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

分子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中间人士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3]750-751}。之所以称“三三制”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步实践，是因为其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性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相吻合，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完善提供了路径。

（一）“三三制”民主的主要选举方式是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权建设的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民主选举是最能体现公民政治权益的方式，而扩大选举权享有范围则是保证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三三制”民主就是通过民主选举所创建的民主政权模式，并通过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范围体现人民立场。

首先，对选举权享有范围进行界定。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法规》明确规定：凡年满18岁的中国人，不分男女、信仰、教育的差别，只要不是汉奸、反共分子、精神病患者，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3]785}。毛泽东认为边区这种“普选的民主政治”将成为“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13]392}。这种直接、平等且普遍的由下而上有序开展民主选举，是中国共产党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权建设的一大贡献。

其次，采取灵活的民主投票方式。针对人民群众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程度，党组织在开展选举工作时灵活采用各种简便易行的选举方式，比如投纸团、投豆子等，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组织在普及民主选举上的决心和毅力，提升了民主选举的真实性、公正性、参与性。

最后，坚持民主选举原则。在选举活动中，党组织严格按照选举原则把控人员组成结构的平衡性和公正性，尤其是共产党员在候选人之中占比偏高时，党组织一定会自觉缩减名额。甚至有些共产党员还会从大局出发，主动退出候选名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三制”民主选举得以顺利推行，极大激发了抗日根据

地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各界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并夺取最后胜利的热情和信心。

(二)“三三制”民主的具体运作形式体现了民主协商

毛泽东指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以有利的条件。”^[14]延安时期,党中央凭借“先协商后决议、先协商后票决”的“三三制”民主具体运作形式,与社会各界开展了充分的民主合作和广泛的民主协商,扎实推动了边区民主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开创了民主协商的历史先河。

首先,中共党员在政权工作中,“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15]。其次,要不断提高协商主体和协商内容的广泛性,通过开展深入的民主协商和广泛的民主讨论,制定“三三制”民主建设施政方针。再次,要坚持协商原则,兼顾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并保障民主协商的真实有效性。1942年,边区政府党组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规则(草案)》明确规定不能“超越政权组织直接下命令指示解决问题,强制党外人士服从”^{[16]263}。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广泛的民主协商,提高了各项决策部署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引起了党外人士的共鸣。

(三)“三三制”民主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得以存在、巩固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因此,“在三三制政权中,党一定要领导,一定要在政治上占优势”^[17]。

首先,准确把握“三三制”民主领导的内涵。能够“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能叫做领导”^{[16]211}。1942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党对“三三制”民主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18]。邓小平明确指出:

“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16]9-12}

其次,坚持党对“三三制”民主的领导权。毛泽东指出,领导权就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3]742}。邓小平指出,党对政权的领导要“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依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16]9-12}。

最后,党的领导要遵循一定的政治原则。“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16]9-12}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因此,毛泽东强调,只要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占据优势,就算人数上不占先机,我们仍能把领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并不能靠气势上的压迫和人数上的优势,而是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和推行民主主张两项措施加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推行“三三制”民主建设中,以理论创新和政治领导为保障,为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主导推动力。

(四)“三三制”民主的民主监督形式保证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第一时间就将民主监督提上日程。

首先,设置相关机构。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是在延安召开。林伯渠认为,“参议会就是一个民主的标志”^[19]。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核心立场,确保参议会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立法机关、权力机关和民意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参议会具体职权包括选举、监察及弹劾,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等^[20],从而确保了参议会组织制度的人民民主属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县级以上各级委员会都相应设置监察委员会,对

各级党员干部实行内部监督。虽然在机关组织的设置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发挥各自职能时互不干涉,即“三三制”政权机关在运作方式是“议政”与“行政”相分离,但是在权力的发挥和运用时两者又互相制约。参议会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包括质询权和对政府官员的监察和弹劾权。与此同时,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建议必须要通过国民参议会决议,各级政府自身也设有内部监督部门。

其次,调动各界民众监督。一是“合作监督”,主要指党外人士参政议政、讨论协商的过程。议员们在参议会上开展充分讨论和广泛协商,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发挥了优化政治资源配置、提高议会的决策能力和政府的执行能力的重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监督意义。二是群众监督。根据政权机关组织法规定,群众具有合法的监督权。边区政府规定,政权机关必须保障民众依法享有监督权,并且能够依法享有对参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司法人员进行批评、监督甚至控告的权利。边区政府动员广大民众进行民主监督的过程,促进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提高了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

最后,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边区政府明确将“拥护并忠诚于边区施政纲领,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21]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同时,在惩治干部腐败方面,对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公务人员的贪污以及其他不法行为进行从重治罪^[22]。这些措施有效提高了干部队伍素质,增强了边区政府廉洁度,杜绝了党内堕落腐化问题,提高了根据地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三、“三三制”民主对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所进行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作为党领导推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初步探索,不仅对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关键作

用。以史为鉴,总结“三三制”民主的经验启示,对于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

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保持其本色、胜任其职能、完成其使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是创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关键所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强力保障。2019年,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才能永葆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政治机关的鲜明本色。”^[23]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要不断完善和加强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和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党员的觉悟与素质,通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党员的感召力,使国家建设发展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立场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2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要时刻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不断加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贯彻落实到党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全过程”^[25]。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强化顶层制度设计作为基本方式方法,以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时刻关注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要继续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继续奋斗的目标,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重要出发点。

(三)坚持统一战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实际出发,找到了“三三制”民主这一组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有效路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能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统一战线工作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而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解放。”^[26]它不仅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同时也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征程中,始终将统一战线放在重要位置,在坚持和运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体现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统一战线通过其自身所蕴含的众多民主功能,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汇聚民意、集中民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必须坚持和用好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

(四)坚持守正创新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

“三三制”民主的推行证明了党的理论与实践应该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充分体现了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的深刻认识与全面把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更加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必须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断总结和归纳,以实际行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就必须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7]1945年,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首次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历史难题”,毛泽东对此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28]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细究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它们都是党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所作出的新思考、新探索。推进自我革命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内生动力,而发展人民民主则是推进自我革命的外部保障。细究“三三制”民主的伟大实践,能够发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而作出的发展人民民主和推进自我革命的初步探索特质,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良性互动中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鲜明品格,始终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的小康情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0.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

- [4]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4.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9.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6.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8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0.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 2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8.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03.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 [1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4.
- [1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14.
- [16] 宋金寿,李忠全.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7] 林伯渠. 林伯渠文集[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309.
- [1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26.
- [19]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8 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77.
- [20]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 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57.
- [21]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7 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97.
- [2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5 辑[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
- [23] 习近平.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2019(21):4—13.
-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4.
- [25]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3.
- [2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40.
- [2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2-10-25]. https://www.gov.cn/xinwen/content_5721685.htm.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 修订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10—611.

(责任编辑:白丽娟)